

第一章

從軍記—— 扶搖直上九萬里

第1節 九歲男孩，飛天夢想

從小，我的個性就豪放不羈，喜歡爬山玩水，對廣闊無垠的藍天，也有種莫名的嚮往。記得第一次看見飛機，大概是1925年前後，當時我才八、九歲。有一天，天空中有架飛機從我家上空呼嘯而過；聽大人說那是「中央」的飛機，因為由南京飛往北京的中途，必須在濟南落地加油。大家都覺得很新奇，很多人還跑去城西的飛機場（實際是一處大操場）觀看。我卻因年幼路遠而未能前往。多年後，一位空軍前輩告訴我，當年那架飛機是陳棲霞所駕駛。後來，我進入航校，陳就是寬橋中央航空學校的初級飛行組長。可是我一直沒告訴他：他那一次長途飛行，激起了一個少年的飛行夢想。

就從那天起，我開始幻想著做個飛行員，「御風而行」的豪氣，不時在胸臆間湧動。我知道「扶搖直上九萬里」，不是莊子的寓言，而是我的夢、我的未來。我將此事告訴家人，大姐復蕓還開我玩笑，在我們學校黑板上寫「飛行家衣復恩」給大家看。誰知這句戲言，成了我生命的預言，預告了我「乘雲氣，御飛龍，遊乎四海」的飛行生涯。

第2節 排除萬難，投考航校

在北平通縣潞河中學讀高三的那年，中央航空學校在北平招生，航校二期的學長林文奎去潞河演講，鼓

勵莘莘學子應在國難時期（九一八日軍侵華後），投筆從戎。林文奎畢業於清華大學，專修地質學；最崇拜法國的拿破崙及中國的兵學家蔣百里；他口才極佳，深具說服力，不少青少年因聽他演講而棄文從武，我也是其中一人。

但當時考航校必須要高中畢業，我與家兄復得商量，冒用他的高中畢業證書去報名，結果被錄取。後來為家父得知，反對我不念大學就去從軍；更不准我冒用哥哥的名字及證件，因此只有作罷。但我並未放棄，勉力把高中念完，並奉父命考進燕京大學；可是由於投身航空的心志，我決定投筆從戎，故爾未進大學。

十餘年後，我在南京總統官邸與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談及此事。由於他曾擔任燕京大學校長，他說：「算你是燕大校友好啦！」以後在我履歷中，有人填寫我是燕大畢業，我則予以否認，只承認是中央航空學校五期畢業的。

後來我父母深知我的心願，也就勉強同意。在報名後被通知到北平某處做體檢，由一位裘醫官執行。體檢通過後又參加筆試，最後是被錄取了；並接獲通知去杭州報到，進入航校第三期（後改為第四期）。

我入航校的保證人，是當時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及航校飛行組長胡家枚。去杭州前先返濟南老家整理行裝，行前並獲當時山東省教育廳長何思源的一封私函，介紹我去見中央航校政治部主任蔣堅忍。那封信我始終

沒有交到，後來也不知丟到那裡。據何廳長說：在北伐時，蔣堅忍是他的下屬，負責宣傳工作。

1933年夏天，家父送我到火車站。在我辭別前，他凝視著我說：

「兒子，我將你的身體交給國家，將你的靈魂交給上帝，你要勇敢。」

這兩句話影響我的一生。多少年來，身處在戰火中能不憂不懼，不惑不亂，就因為我將自己交給了上帝和國家。

火車經南京轉上海，父親託人到車站接我，並安置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

第3節 初到江南，大病一場

我初到上海，五光十色，讓人眼花撩亂，不敢外出亂逛，僅繞著青年會，轉了兩圈，次日即搭火車去杭州。因距報到時間尚早，便住進西湖邊一家旅館。那裡天氣很熱，每遇週末，多半是林文奎、或者是復得的清華同學沈崇誨、或教育家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祜帶我去西湖邊遊覽。

初訪西湖，很是興奮。兩道長堤，一湖山色，風波浩瀚。當時走在蘇堤上，無法體會蘇東坡把美景衍化成詩文的意境。後來有暇，捧讀蘇文，並重溫昔日記憶，

才有了新的領悟。

及至梅東高橋入伍生隊報到後，恐怕是在湖邊吃了不潔之物，不數日後，我就染上傷寒；當時只覺得身體發燙，竟用冷水淋浴。同學見狀不佳，報告學生隊長，趕緊把我送入杭州廣濟醫院。那時傷寒是很危險的病，除靜養外，並無特效藥可治。醫師囑我躺在床上，不可移動；飲食極少，惟恐腸子破裂，併發腹膜炎，就回天乏術了。在病中，雙親特到杭州來探視，家母再三叮囑，萬勿擅動。我臥床數週，背部雖由護士常用酒精按摩，但仍有潰爛現象。

一天傍晚，主任醫師巡房，手指我床，與當班護士私語；之後每數分鐘，護士即至我床，以手按我耳根。當時我意識到我的病情危急，可能命在旦夕之間！所以我猜想是醫師囑咐護士要特別注意。病榻上祇覺得長夜漫漫，終於一道曙光破窗而入，我渡過了生命中最危險的一個黑夜。

感謝上帝，我的身體從隔日起便見好轉，高燒漸退。一週後，醫生已准我進米湯少許，並視我身體狀況，每日加添飲食，體力也就逐漸恢復。後來醫師甚至准我去西湖畔散步，並可吃素麵一碗。那時的胃口，可說吃什麼都覺得是人間美味。所以在我出院返回濟南後，不到兩個月就變成一個胖子；到北京看大哥復得時，他幾乎不認識我了。

第4節 入伍歸隊，鍛鍊體魄

待我完全康復後，奉命返回杭州梅東高橋，隨航校第五期入伍，接受嚴格軍事訓練。入伍期間，每日幾無一分鐘空閒：立正、稍息、跑步、擦皮鞋、整理內務。晚上倒頭即睡，實在疲憊不堪。

當時我們的總隊長是龍韜，他是一個小胖子，每次指揮我們繞操場跑步時，雖然也陪我們跑，但卻只是跑內圈。我們這些愛搗蛋的小伙子，遂起鬨要總隊長以身作則；總隊長迫於無奈，只好跑外圍，數圈後，只見他滿頭大汗，從此不再親自指揮我們跑步。

航校的入伍訓練十分嚴格，自天亮起來，到夜晚就寢，一分一秒都不得休息。在打野外（野戰訓練）時，午飯後可歇息片刻。我們是在杭州附近的松木場演練；那裡距黃龍洞很近；午飯後，同學們就在附近廟裡小睡，醒來只見躺身之石板上全是汗水。小憩過後，下午再練，傍晚才步行回營。大家疲乏至極，甚至走著路也會睡著。行軍中，後邊的人有時拽著前邊人的刺刀，走著走著即朦朧睡去，剛要跌倒又被驚醒。此種邊走邊睡的情形，除非自己體驗，很難相信。

同儕中也有頑皮分子，記得有一位印尼華僑同學俞昌福，因違規被罰「兩腿半分彎」，也就是把槍舉起、兩腿彎曲、站著不動，直到區隊長喊停。這位老兄國語不佳，假裝聽不懂，請求區隊長示範一下，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區隊長大為光火，但卻無對策，所以此項罰

則，以後也就沒有再用了。六個月軍訓下來，雖有一、二人退學，但大多數同學都留下來。我因志在飛行，所以從未向父母吐過一滴苦水，家書中盡是軍中美好的一面，讓雙親安心。

入伍的頭三個月不准出營，有時整隊由值日區隊長帶去遊覽，由區隊長任導遊，站在白堤上高喊：「向左看是西湖，向右看是裡西湖。」路人投以好奇的眼神，看我們這群阿兵哥的頭左右擺動，十分滑稽。

轉瞬三月期滿，隊長宣布可以外出，但不准進飯館用餐，只可購買食品去野餐。試想，三個月吃軍糧，那有不嚮往吃頓館子的？於是約好五、六位同學，至西湖邊一家四川館子，進入內室；正在大吃大喝之際，忽見隊長勞聲寰，掀簾而入。我等在情急之下，起立讓座：「請隊長吃點東西！」勞隊長一笑，點頭而去。第二天隨即宣布我們五、六人全部禁足，下週留營服勞役，不准外出。大夥兒大嘆這頓飯的代價，未免太高了！

第5節 飛行訓練，專攻轟炸

在入伍期間，管教雖嚴，但大致而言，還算合理。因為我們都是將來的飛行軍官，所以學校當局交代要善待我們這群愛搗亂的青年。六個月期滿，遷往杭州附近的笕橋，學科過後立即上飛機，七、八人一組，每組分派飛行教官一名。

我們這組起初是由美國教官格林勞（Greenlaw）帶飛，此人吊兒郎當，經常在飛機上吃花生。那時的初級教練機是弗立特（Fleet），座艙是開放式的，他老兄在前座吃花生，花生殼往後一扔，就正好打在後座學生的頭上；幸虧大家戴著一頂飛行帽，還可抵擋一下。他還有一個毛病，就是經常將飛機落在錢塘江邊小便，有時還拉野屎，讓學生坐在飛機上等候。他人很胖，但有一位很漂亮的老婆。據說，他不在校的時候，只有胡家枚科長可以去看她，胡科長是留過學的，山東人，很魁梧。我們跟格林勞飛了三個多鐘點，即換毛瀛初當我們的教官，他技術高超，認真而有耐心。我們飛了大約六至八個小時，即行單飛。

初級結束，轉入中級班，飛機是達格拉斯（Douglas）雙座教練機，機型較大也較快，課目也不同。到了高級班，則要各學生先行自己選科，我選了「轟炸」；理由很奇怪，我不想飛單座戰鬥機，而願意選多座轟炸機，因為「要死，也得有同伴相隨」。我之喜愛朋友，可見一斑。

我們這一期（後稱五乙），在1935年底即已受訓完畢，但因等洛陽分校的五期甲班（五甲）結訓，所以到1936年1月20日才舉行畢業典禮，由蔣校長（中正）親臨主持，那時的副校長是周至柔將軍。典禮很隆重，並舉行懇親會，我父母亦應邀參加。本來家父還被邀請代表家長致詞；但他看我似不高興，於是作罷。我之

所以不高興，是因為我一直以為：我的畢業成績應該是優等，因為從每月公布的學科成績表中，我都是名列前茅；結果畢業的總成績卻只是中等，令我甚為不解，也十分不滿！原來因為我曾與同學打過架，被關禁閉一天，品行分數因而欠佳所致。這大概是我在航校中僅有的一次不良紀錄，也是我同期同學中唯一被關者，這讓我終生難忘。

畢業後回家的一天晚上，家父把他原本準備在畢業典禮上想講的話，說給我及家人聽，大意是：「各位家長把寶貴的兒子獻給國家，希望政府訓練他們不只是勇，而且也是有謀之士。」父親並引用孔子對子路所說「暴虎馮河」一篇，請政府多愛護這群孩子。但家長們的這個願望似乎未能完全達到。

第6節 分發部隊，進駐廣州

畢業之後，我官居准尉，奉派至新成立的空軍第九中隊，駐寬橋接收諾司路普（Northrop）單引擎雙座轟炸機。隊長是石友信，副隊長謝郁青。石為西北軍閥石友三的弟弟，後聞因某案被牽連。謝郁青則是湖南人，為一標準軍人，勇敢善戰，待部下寬嚴並施，為人坦誠，深為大家所愛戴；可惜後來患白血球病，在成都治療無效，英年早逝。

在寬橋做學生，從開始到入隊期間，遊覽過不少江

南名勝。西湖自不用說，其他如「海寧觀潮」、「超山探梅」、天目、天台、黃山等地，也都足跡踏遍。我們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小伙子，第一次有機會飽覽異地的山川勝景，蒼莽的大地，群峰競秀。朗朗笑語中，誰也料不到日後會有這麼多人，用自己的熱血來捍衛這片美麗的山河。

畢業的同年，也就是1936年，發生了「兩廣事變」，我空軍第九中隊奉命進駐廣州天河機場。初到廣東，一切都很新鮮，特別是當地的理髮師多是女性。但由於事先已被警告：廣州多麻瘋，身體接觸最易傳染。雖不知傳言是否屬實，大家也只有敬而遠之。那時的廣州還很落伍，我們住在機場附近的鄉下，衛生環境很糟，老百姓生活亦苦。有名的荔枝灣，水渾如泥、垃圾漂浮，卻還有很多人在其中游泳。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是城中主要觀光點。

在那段時期，我也曾夥同吳祖蘅、孫承謙等同學去香港一遊，住進思豪大飯店，那是一座英國老式的建築，每室均有吊扇，還算涼爽。那時香港人口約為二十餘萬人，與今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廣州距澳門也近，有幾位同儕常乘火車去賭，我則從未領教過；直到1989年，大陸開放後，才同吾妻前往觀光一天，也看了賭場。我直覺印象平平，與美國的賭城拉斯維加斯相比，澳門可稱小巫。

第7節 投彈演練，西安事變

「兩廣事變」在廣東空軍全部投順中央後結束，我們重返筧橋。那段時期可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我們每日做飛行訓練，主要是轟炸課目，當時按照日本軍艦空視形狀，用白粉在錢塘江畔畫在地上。我們用兩百磅重練習炸彈來回演練，飛機是諾司路普全金屬下單翼雙座輕型轟炸機，投彈瞄準器好像是D-4，非常原始；但我隊郭偉立同學投彈技術神準，簡直是百發百中。當時的假想敵和轟炸目標主要是上海的日軍兵營及停在黃浦江上的日本軍艦。為了進一步了解目標，我們曾著便衣，乘火車赴上海，在上述各目標區做地面觀察。弟兄們仔細勘查，做好一切準備，一場歷史性的暴風雨已醞釀在望了。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像暴風雨來襲前的一道閃電，撼動了整個中國。我們奉命進駐洛陽，主要的任務是空中偵察，目標是隴海鐵路和西安市。我駕機在西安上空盤旋，鳥瞰這個歷史的古城，彷彿飛進歷史的中國。一剎那間，我內心澎湃洶湧，感慨莫名。

記得有次空中偵察，洛陽正下著大雪，我沿著鐵路低空飛行。經過華陰縣時，突然機尾一聲巨響，到了洛陽落地，才發覺飛機直尾翅上竟然掛了一條粗電線，機身劃了一道長痕，真是有驚無險。這是我飛行生涯中僅有的一次損傷飛機的記錄。

西安事變當時，政府中好像有主戰及避戰兩派大員，我們在空中偵察，曾看見大批國軍沿鐵路向西安前進。但後來委員長脫險，由張學良陪伴，飛返南京，所謂「西安事變」也就戲劇性告一段落。在蔣委員長座機經過洛陽落地加油時，我首次看到張學良，他人略顯清瘦，神情嚴肅地在隨從的簇擁下離去。



1936年笕橋中央航空學校畢業後被派空軍第九中隊時攝。



1936年5月中央航空學校畢業後，奉派第九中隊任准尉飛行員，在我所駕駛的第一架飛機——美國諾司路普機前留影。